

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理論 與中共改革開放政策

林祐蕓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中共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基本上就標誌著當前大陸社會並不和諧，尤其是中共長期實行不均衡的「地區傾斜」發展戰略，已經讓大陸社會的內部矛盾日益惡化，動搖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基礎，在伴隨改革開放以來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更加複雜多變，對於政府政策深感不滿不安的社會意識，成為不和諧社會的根本源頭，更也使得中共推動改革開放政策面臨種種挑戰。

然而，掌握意識形態的主導權與解釋權，是中共黨國體制下，領導人鞏固領導權的重要工具，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意識形態思想體系，作為繼續推動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脈絡，不僅首度提出以「社會建設」為主軸的戰略發展目標，更將「科學發展觀」視為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質運用準則，強調堅持以人為本，目的在於讓中共領導集體主動推出的意識形態思想體系被人民獲得認同與信任。

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希望能夠建構一個屬於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實踐型意識形態，以樹立黨內理論權威地位，為自己新的政策方針建構合理化、合法化的基礎。這更突顯出中共第四代領導當局因應隨著改革開放而來的社會轉型困境，所進行政策的調整與轉向，同時呈現出改革開放後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持續與轉變。

關鍵詞：和諧社會、改革開放、科學發展觀、意識形態、以人為本

Hu Jintao's "harmonious society" theory and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f CCP

YOUCHIN LIN

Tamkang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Master Candidate

Abstract

CCP propose "socialistic harmonious society" theory which basically indicates China's inharmonious society situation. More contradictions inside society and even wreck CCP's leadership, especially when CCP implement the long practice of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People's concepts and values have changed during transformation since 1978, and those social awareness become origins of inharmonious society which are now challenging CCP's reform and open policy movement.

However, CCP's 4th generation leader Hu Jintao propose to create "socialistic harmonious society" ideology which will continue CCP's reform and open policy process. The idea is first time present "social construction" as main strategy object, and also applied with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CCP want this kind of people oriented ideology can be accepted by their people as the leadership can be secured in party-state system.

In further reason, CCP hope to establish an ideology for their 4th generation leadership group that can have authority on basis to control and legislate in legitimacy in the party. This points out how 4th leadership manage social adjustment in such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also represents CCP's main idea about reform and open policy.

Key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reform and open policy,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deology, people oriented

壹、前言

中共自 1978 年 12 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確立改革開放的「實事求是」發展道路，經由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政策方針，使得改革開放的政策更為落實，進而帶動綜合國力的提升，藉以探索與展現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將市場經濟引入社會運作之後，經濟增長成效顯著，一直吸引著世人的關注，然而，在市場化與私有化改革的同時，原本中共在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之下，所堅持的集體主義原則已遭受破壞，出現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嚴重問題，社會發展失衡，進而對訴求公平均等的社會主義政體執政的合法性產生質疑。

自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上台執政後，陸續從 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公開提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概念，將其列為中共加強提高執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2005 年 10 月，中共召開第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十一五規劃》建議時，也提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2006 年 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第十六屆六中全會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主要議題。

從近幾年來中共官方歷次會議文件的字裡行間，皆可看出中共領導當局對「社會」發展狀態的高度重視，事實上，中共目前正面臨一連串社會矛盾問題，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雖然發展快速，但卻也製造了社會不公平、不和諧。因此，胡錦濤之所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即是為了因應政經情勢與社會文化的變遷和挑戰，同時冀望穩定且延續中共政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而中共堅持持續推動改革開放政策的施政主軸方針，勢必將適時地進行改善和調整，以合乎達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確切需求。

有鑑於此，胡錦濤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與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兩者變項彼此之間，必定具有緊密且重要的發展關聯及影響特性，故筆者在本研究中欲試圖從意識形態研究途徑的視角著眼，輔以文獻分析的方法，瞭解以下幾項脈絡變遷與過程發展。

- 一、瞭解中共「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源起與意涵。
- 二、瞭解中共持續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政策，到了胡錦濤主政時期，已經面臨怎樣的問題或困境，因而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在主政兩年後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而胡錦濤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對於改革開放政策具有何種指導意義。

三、瞭解胡錦濤執政時期的改革開放政策，相較於鄧小平與江澤民時期，所作出的具體政策調整作為。

四、瞭解「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在中共推動改革開放政策的挑戰中，所具備的特質及影響。

貳、中共「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源起與意涵

一、中共「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源起

中共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中，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為《構建和諧社會決定》)文件，對於中共第四代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所提出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開展，具有引領性和指導性的重要作用，在此篇文件內容中，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立基點上，即開宗明義地表明：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¹

藉由此段文字論述，可以顯示出中共第四代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對於官方意識形態作為一個觀念系統，以及一個信仰體系所具有思維形式的結構特性，並藉以印證與強化《構建和諧社會決定》之必要正當作為。此外，因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儒家思想重新受到中共胡錦濤執政當局重視與運用。

二、中共「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意涵

中共在十六屆 6 中全會中所通過的《構建和諧社會決定》內容裡，明白揭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時要遵循「六個必須堅持」的原則，分別包括了必

¹「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2006 年 10 月 18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須堅持以人為本、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民主法治、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以及必須堅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之此六大原則。

依據中共學者的歸納與分析，關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性質，具有三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具有六種特徵的呈現狀態。

2005年2月，胡錦濤在中共「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

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²

(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四位一體」的總體建設布局。

2005年2月，胡錦濤在中共「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更加明確地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³

這是中共第一次將社會建設獨立地分離出來，把社會建設提高到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同等重要的地位，建構起「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

(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

在中共召開十六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構建和諧社會決定》內容中表示：

我們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和諧社會。「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⁴

² 胡錦濤，「深刻認識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人民日報(北京)，2005年2月20日，第1版。

³ 同上註。

⁴ 「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2006年10月18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總括而言，中共召開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構建和諧社會決定》，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當成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戰略任務，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其內容包括：

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原則。三、堅持協調發展，加強社會事業建設。四、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五、建設和諧文化，鞏固社會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六、完善社會管理，保持社會安定有序。七、激發社會活力，增進社會團結和睦。八、加強黨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領導。⁵

這項決定文件，是中共自執政以來，第一個加強社會建設的重要文獻，成為指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綱領性文件。在文件中將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點工作涵蓋政治法律、經濟生活、就業和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與管理、思想文化、創新能力、社會公共秩序和生態環境等八個方面，全面、深刻地闡明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性質和定位，使得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成為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最重要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工作原則和對內重大部署。另外，在此決定中表示，按照中共的戰略目標，冀望於 2020 年達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

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意義

一、當前中共社會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根據由中國大陸北京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所出版的《2010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之社會藍皮書中指出：經濟建設成就之大超乎預想，社會矛盾問題之多出乎意料，這「兩個想不到」是在中國進入發展的關鍵時期，即工業化中期階段之後開始集中顯化出來的，這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新階段性特徵。

6

這樣的「兩個想不到」，在中共學者們的眼中是「突出的經濟發展與尖銳的

⁵ 同上註。

⁶ 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2010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193。

社會矛盾問題並存」的狀態，可以說是呈現出兩個極端的格局，處置在同一個場域時空之下，更不可否認的是社會結構必定受到嚴重的轉化和變動，面對此般情況，夾雜交織著改革開放發展的喜悅以及社會關係脫序的憂傷，有誰還可以篤定地確認這是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社會，是為一個有機整體，當在此體系之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層面發展與社會出現不協調的狀態之時，即會導致社會問題的引發和延伸，若不認真妥善應對，後果不堪設想，將可能導致社會關係體系的崩解，甚至連帶造成統治權威的危機。這也難怪會令人想到為何Susan Shirk會認為中共其實是一個外強中弱的「脆弱的強權」(fragile superpower)。⁷

綜觀當前中共社會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分別為：

- (一)貪污腐敗風氣猖獗，法制觀念脫序不足。
- (二)各種收入差距日益擴大，擴大內需面臨困難。
- (三)就業市場形勢嚴峻，社會保障缺陷失衡。
- (四)社會事業建設發展落後，上學看病大不易。
- (五)思想多元化與社會理性道德的缺失。
- (六)三農問題和「新三農」問題並存，農村發展危機重重⁸。
- (七)群體性事件影響廣泛，刑事犯罪活動猖獗。
- (八)環境保護意識薄弱，生態問題日趨嚴重。

由此可見，上述種種社會矛盾與問題，已對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構成嚴重的威脅，因此，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所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重要立意，即是希望能夠對於必須堅持的改革開放政策，注入指導意義與發展價值，以期突破當前中共社會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⁷ Susan Shirk, *China-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⁸ 「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一直是中共改革過程中最為棘手的環節，除了在改革開放初期短暫好轉外，之後中共農民的收入幾乎與驚人的經濟成長率脫節，導致農民的收入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日趨拉大的局面，引發出各種社會矛盾問題，讓中共逐漸重視三農問題的施政目標。當前的「三農」問題的焦點集中於農民負擔過重、農民收入成長緩慢、農民運動加劇等狀態。但是，就在全球化和中共社會快速變遷的背景下，中共的農村、農業、農民都不再能夠脫離於這個大背景下孤立發展，繼而衍生出「農民工、失地農民和農業村落終結」的「新三農問題」。根據中共學者的估算，目前全中國有上億進城農民工，進城農民工從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就已替代鄉鎮企業職工成為轉移農村勞動力的主要渠道；但直到今天，中共還沒有關於進城農民工的戶籍身份、勞動保護、社會保障、醫療待遇、子女就學等方面的立法。另外，在失地農民方面，近幾年來，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出讓金」成為城市建設最重要的非財政「可使用資金」的來源，各種不斷擴張的開發區、工業園區、大學園區大規模圈地，與此同時，失地的農民也激增到數千萬人，危及農業村落的終結。中共的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 60%，農民人均純收入不足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和「新三農問題」(農民工、失地農民和農業村落終結)並存，已成為中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大難題。參考資料：李培林，*和諧社會十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90。

二、「科學發展觀」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意義

中共「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意義，就是「科學發展觀」⁹。由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的報告內容，可看出「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改革開放」三者間深切的關聯性，尤其注意到「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是內在統一」的性質，因為「沒有科學發展就沒有社會和諧，沒有社會和諧也難以實現科學發展」。¹⁰

值得一提的是：「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是由中共第四代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所提出的執政思想，所以，其次，應先針對兩者間的關係進行理解，有位中共學者就此提出三段論證：

第一，社會和諧與科學發展觀在理論範疇、層次和角度上是有區別的。前者是價值取向、社會狀態；後者是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當然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

第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同落實科學發展觀在價值取向上是一致的，在目標任務、根本要求方面是統一的。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同落實科學發展觀強調的側重點有所不同。落實科學發展觀是從發展的角度求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則是從和諧的角度促發展，是從社會關係、社會狀態方面反映和檢驗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成效。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才能實現社會和諧；而社會是否和諧，又是檢驗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客觀標準。

⁹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而「科學發展觀」這一完整術語的確立，則是於2003年8月18日至9月1日胡錦濤在江西考察時所提出，當時他提到：「要牢記樹立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積極探討符合實際的發展新路子，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資料來源：胡錦濤，「發揚井岡山精神，全面建設小康」，**新華網**，2003年9月2日，<<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2003/Sep/396482.htm>>。直到2007年10月，中共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中，提出了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觀點，這個理論體系除了繼承鄧小平理論，重申「三個代表」理論之外，還把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中首次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列為此一理論體系的構成要素，並將之定義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胡錦濤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胡錦濤還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視為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目標，把「科學發展觀」視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此外，「科學發展觀」在「十七大」中正式寫入黨章。資料來源：「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人民網**，2007年10月15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105264/105268/6379572.htm>>。

¹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1720~1721。

因此，科學發展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體系中的指導思想。¹¹

最後，筆者藉由以上論述內容推論得知：「科學發展觀」是要在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之基本路線的前提下，繼續強化「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以作為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原則，在運用科學發展方式的過程中，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歷史過程和社會結果，逐步同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於中共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領導集體而言，三者之間，缺一不可。唯有在堅持「改革開放」方向的基礎上，透過「科學發展觀」的準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才得以實現。所以，「科學發展觀」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意義。

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是胡錦濤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意識形態思想

透過上述，可加以理解「科學發展觀」是胡錦濤實施一切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質運用準則，同時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落實核心判準。所以，同理可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是胡錦濤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意識形態思想。因為，意識形態絕非是一成不變的思想體系。它們在某些觀點上彼此重疊，有時甚至有著共同的關注和共通的詞彙。另外，意識形態也總是隨著政治和智識上的變化而有所更新，一方面因為它們彼此互動，並受其他意識形態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因為它們為了適應轉變中的歷史環境，隨著時間遞移而有所更迭。¹²

在中共研究的領域中，意識形態(ideology)一直是個重要的範疇。在諸多研究中共意識形態的著作裡，美國加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舒曼(Franz Schurmann)所著的《共產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一書，對建立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研究途徑來說，算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經典著作¹³。舒曼在此書中，首次將意識形態分為「純粹意識形態」(pure ideology)和「實踐意識形態」(practical ideology)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並以此概念架構來分析中共作為一個組織，其意識形態所具有的特殊功能與意義。

¹¹ 賈建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點難點問題解析」，*馬克思主義研究*(北京)，2006年第3期，頁9-10。

¹² Andrew Heywood著、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等譯，*最新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文化，2001年)，頁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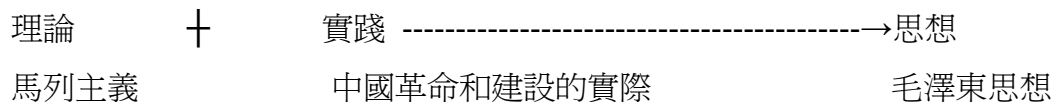
¹³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依據舒曼的觀點，「純粹意識形態」(pure ideology)是由理論所衍生而成的，而「實踐意識形態」(practical ideology)則是作為純粹意識形態和行動之間的結合劑。由於中共向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來概括意識形態的內涵，並且將「馬列主義」視為是「理論」，而將「毛澤東思想」視為「思想」，因此，舒曼就從中共謹慎地使用和區分「理論」與「思想」這兩個概念的作法來對應其理論，而提出「理論」是用來指涉純粹意識形態，「思想」則是用以指涉實踐意識形態的觀點¹⁴。

既然「理論」和「思想」可以對應於「純粹意識形態」和「實踐意識形態」，那麼，「理論」和「思想」也同時構成中共的全體意識形態。換句話說，「理論」是指涉組織的世界觀內容，而「思想」則涉及到組織的直接行動。由於思想的創造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也就是要不斷地將理論和實際行動連續地結合統一於思想中；因此，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便在這裡建立了一個結合理論與實際的模式而成為共產黨員每天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核心部分。根據這樣的分析基礎，舒曼構作了一個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創造過程(如圖一)。¹⁵

¹⁴ 同上註，頁 23。

¹⁵ 同上註，頁 30。



圖一：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創造過程

由上圖的解釋，可以看出，在舒曼看來，中共的意識形態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世界觀，再加上經由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需要所提出的毛澤東思想，兩者共同構成其意識形態的全體內涵。¹⁶

從舒曼的分析架構中，可理解毛澤東時期中共意識形態的創造過程，雖然舒曼的研究時間範圍是以毛澤東時期為主，但是，筆者認為舒曼所提出的此一分析中共意識形態創造過程的架構，仍可應用於當今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的執政時期。縱使隨著歷史時空、內外情境的變遷的同時，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也隨之產生相適應的修正，為以符合促進國家現代化的要求。¹⁷

在此簡要地回顧一下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採取「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式，實施一黨專政的獨裁制度，晚年更發動「文革」而造成嚴重的「錯誤」。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於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戰勝「兩個凡是」後，否定毛澤東的「極左思潮」，提出將工作重點轉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改革開放」政策，強調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鄧小平利用改革開放政策鞏固中共的統治地位，而非僅靠意識形態的灌輸，與毛澤東採行極權式的意識形態相比大不相同。而到了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時期，持續遵循著「鄧小平理論」進行改革開放，提倡「三個代表」，以提高政治的辨別力。

時至今日，是為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執政時期，在國家發展方向上依然

¹⁶ 同上註，頁 26~27。同時另也參考：張國聖，「論析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研究途徑」，**中共研究**，1998 年 1 月，第 32 卷第 1 期，頁 97~98。

¹⁷ 在 1945 年的中共「七大」，中共正式把馬列主義說成是「純粹」的抽象的指導理論，而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實驗性的指導思想；換句話說，在中共的「七大」，中共正式承認它所標榜的意識形態有純粹的和實踐的兩個部份，前者是指馬列主義的有關理論，而後者則是指毛澤東的有關思想。鄧小平上台之後，透過「實踐檢驗真理」的運動，首先打破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論，從而透過改革政策的發展以及所謂「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標榜，企圖學毛澤東在「七大」的作法，將馬列主義毛思想「供」起來，讓它們升格為「純粹」的抽象的意識形態，與實際的路線和政策的運作完全脫離開來；從而使得自己的思想路線成為指導中共路線和政策運作的「實踐」性意識形態。參考資料：李英明，「論中共意識形態」，**共黨問題研究**，1987 年 12 月，第 13 卷第 12 期，頁 32。

承繼著自鄧小平以來的「改革開放」道路，然而，卻不得不面對中共「意識形態的控制將逐漸失靈」¹⁸的事實，有關胡錦濤的意識形態創造過程，可從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的報告內容中，獲得清楚明晰的理解，在主題為「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篇章中，胡錦濤指出：

十六大以來，我們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順應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發揚求真務實、開拓進取精神，堅持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著力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踐中堅定不移地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繼續向前推進。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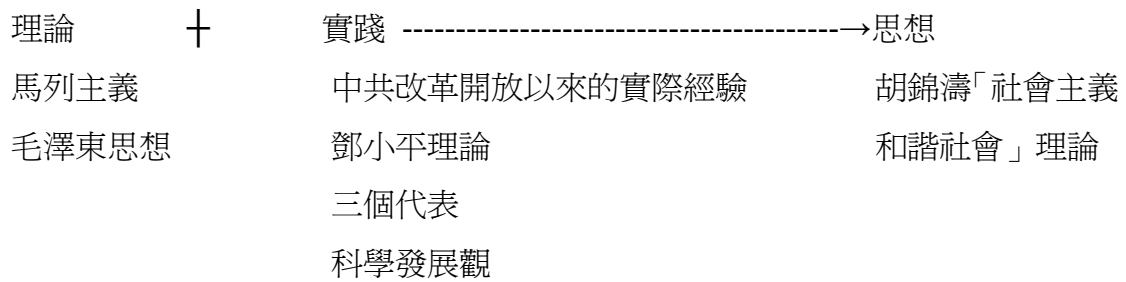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²⁰

因此，可明確體現到胡錦濤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視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理論」，亦即為舒曼所稱之的「純粹意識形態」，而在「十六大」之後執政的實踐過程中，則是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際經驗，同時結合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為其執政的「思想」根源，以構成「實踐意識形態」，最後結合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的實際需求及現實狀態，進而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思想體系，「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即成為胡錦濤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意識形態思想(如圖二)。

¹⁸ 根據此書作者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將逐漸失靈」觀點說明：在於認為鄧小平統治時代是中共意識形態變遷最大的時代，變遷始終依循兩個基本原則：一個是拋棄一些不合時宜的理論框框，以適應改革形勢的需要；另一個是從馬列主義中尋找理論根據，以合理化一切改革政策。江澤民自 1997 年「十五大」以後，面對的是如何推動更深化、更核心的改革。為了深化改革，繼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及 1992 年鄧小平南巡時衝破「姓社姓資」爭論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後，江澤民於 1997 年更衝破「姓公姓私」的爭論，進行第三次思想解放，使私有財產在大陸再度復活，加上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將使中國大陸面臨世紀大變遷。參考資料：吳安家，**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1949~2003 年)(台北：國史館，2004 年)，頁 829~830。

¹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頁 1716。

²⁰ 同上註，頁 1718。



圖二：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的官方意識形態創造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至胡錦濤上任執政後，不斷重申毛澤東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並且再三強調對「社會主義」特性的堅持，無非不就是希望能夠挽回自鄧小平以來意識形態的控制將逐漸失靈的態勢，同時在原有的執政基礎上，開創符合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意義，且依循「科學發展觀」為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施政準則，其中目的乃是為了彰顯中共領導人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的主要關鍵取決於能否維持中共的統治地位，只要有助於鞏固中共領導地位的部分，中共當局都敢循序漸進的開放，反之，則繼續加以堅持。換言之，一黨專制所賴以存在的基礎是經濟資源與政治權力的壟斷及意識形態的支撐²¹。

肆、胡錦濤執政時期改革開放政策的調整

一、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原則與方法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舉行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此次會議中，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中共標誌著自此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此中共十一屆全會中鄧小平進行名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主題報告。隔年1979年，鄧小平在中共黨的理論工作務處會議中，作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指出：實行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

²¹ 吳安家，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1949~2003年)，頁828。

毛澤東思想²²。從此之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便成為中共推動社會主義改革的重要方向與特徵，中共更將鄧小平視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和總設計師。

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原則，是由起初的漸進式至 90 年代開始才採取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對於這一過程的探索，可由 1982 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 1984 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再到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提出「計畫與市場內在統一的經濟體制」，直到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 年中共 14 屆 3 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五時條，標誌著中共透過改革建立新體制的總體規劃已經形成。而中共的改革開放在 90 年代中期已經進入「整體推進」的新階段。²³

另一方面，中共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過程中，在經濟層面上，採取的是「非均衡發展」的方法。經濟非均衡發展的方法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時間上的非均衡，即經濟發展有起有落，總是在波浪中前進的，是為一種「台階式」的發展思路，鄧小平在 1991 年 8 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可能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台階，跳了以後，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再前進」。²⁴對此，中共學者劉吉進一步闡述：

鄧小平所講的“波浪”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起起落落，更不是大起大落（那是政策失誤），而是“台階”式的不斷上升。它意味著經濟發展不可能四平八穩，以等速直線上升，而是“跳躍”與“穩定”相交替。²⁵

其次，是指空間上的非均衡，即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終走向共同富裕。這是鄧小平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總結，鄧小平指出：「要讓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來，搞平均主義不行」²⁶、「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²⁷。

總而言之，中共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過程中，採取由漸進式到整體推進的

²² 《改革開放三十年》編寫組織，**改革開放三十年**（北京：中文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165。

²³ 劉吉，**社會主義改革論**，頁 31~32。

²⁴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75。

²⁵ 劉吉，**社會主義改革論**，頁 137。

²⁶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52。

²⁷ 同上註，頁 23。

原則，主要以經濟發展為優先，以先經濟後政治，進而拓展到教育、文化各領域的改革與開放。而在在經濟層面上，採取的是「非均衡發展」的方法，以讓部分的地區先富起來為優先考量。

二、胡錦濤時期改革開放政策的特性

從上述討論的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原則與方法的內容中，認知到中國大陸的國家總體經濟發展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現在乃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成分並存的體制，這般體制的出現，亦是因應改革開放政策的轉型而生。因此，可以判斷出中共的社會轉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進行的；這就是說，它不是在政權發生更迭的條件下急速進行，而是在原有執政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逐步實現。

轉型時期是一個社會關係趨於緊張的時期，依據中國大陸經濟學者吳敬璉的分析表示：

大陸改革推動的社會轉型有一個特殊點，那就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相伴隨，進行著由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而在一個變革的社會中，有利於穩定的因素和不利於穩定的因素同時存在。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的各種社會矛盾往往集中反映在各社會階層收入差距的擴大上。在轉型期間，當遊戲規則的改變發生時，新規則的缺乏可信性會造成社會的無序。²⁸

由此可見，在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三十多年中，中共的社會結構發生的巨大的變化，一些舊的社會矛盾開始緩解，一些新的矛盾開始產生，有些社會矛盾還有所加劇，對社會的和諧造成很大的衝擊影響。

因此，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指導下的改革開放政策，具有何種有別於以往改革開放政策的特性，以及其所帶來的施政整體方向意義為何，成為值得探討的關鍵。

²⁸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探索中國經濟順利轉型的秘密*(台北：麥格羅希爾，2005年)，頁464~467。

(一)邁向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

從巨觀的視角觀之，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指導下的改革開放政策，為中共的整體發展模式邁向新的社會轉型階段，就是由粗放的發展向科學的發展轉變、由經濟體制的轉變向社會全面轉變，是中國的第三次社會轉型。亦有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學者明白指出「科學發展觀」就是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²⁹。

中共學者指出：

第三次轉型是要解決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問題，且還要繼續解決前兩個轉型遺留的老問題，解決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綜合性深層次問題，是中國近代轉型的總攻和決戰。³⁰

科學發展觀，是作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意義，成為胡錦濤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重大特徵，不同於以往的撥亂反正和找出路，而是在原有的改革開放道路上進行調整，標記出全面、協調、可持續、人本四個面向，用以矯正片面、失調、高消耗、物化四個偏差面向，強調在綜合的、關聯的和配套的認知方式解決問題，同時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增強在擴大開放條件下促進發展能力，以維持體系脈絡間的平衡效益，在「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要求下，落實科學的發展方法，成為胡錦濤時期推行在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下之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特性。

(二)從「經濟增長」到「經濟發展」

從「經濟增長」到「經濟發展」的過程，主要的性質轉變，就是將從原本的「先富論」轉向「均富論」，意謂著拋棄以往在改革開放初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觀點，在平均主義的思維下著重「讓全部的人都能均等富裕」的概念；也就是要告別以往一味過度重視 GDP 的增長，以突破用單一 GDP 來衡量發展的觀念，使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維指標來衡量發展的結果，認清增長不等於發展的事實。

²⁹ 宋國誠，「科學發展觀—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97。

³⁰ 關於中國的前兩個轉型，根據中共學者的觀點乃意指：中國第一次轉型是從 1840 年到 1949 年之間，也是從中共革命時期到奠定中共建政基礎這段時期。中國第二次轉型就是改革開放，這次的轉型不僅要繼續完成原有的任務，而且要克服一整套極左的思想方法和價值觀念。參考資料：鄭佳明，「中國社會轉型與價值變遷」，*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北京)，第 25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113、114、116、119、120。

在中共《十一五規劃》內容中，明確表示：「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發展既要有較快的增長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加快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與「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³¹。由此可發現中共正從原先完全注重「經濟增長」到至今要求平穩「經濟發展」的過程，也就是說中共當前的經濟仍然要持續增長，增長的目的就是要爲了要解決民生問題的困境，而經濟發展就是爲了要保持穩定。

中共學者遲福林也對此作出精闢的詮釋：「由經濟增長向經濟發展的理念轉變。我們需要終結的是以GDP爲中心的增長主義，因爲它無法解決資源環境的矛盾問題，無法解決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問題，無法解決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問題。所以增長和發展既有聯繫，又有不同，發展的基礎在於增長，但是發展還包括結構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就業問題、資源環境問題，所以不能以增長來代替發展」。

32

(三)進入以「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爲重點的新階段

自胡錦濤執政以來，中共才真正開始重視「社會建設」的開展，中共從 2004 年召開十六屆四中全會才第一次陸續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社會建設」的戰略任務，正式進入「四位一體」的總體建設布局。在中共《十一五規劃》建議中也將「必須加強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納入其中。

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將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社會管理等部分，作爲社會建設中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的重點。在《十一五規劃》中的具體政策上，分別陸續制定頒布《國家教育改革與發展中長期規劃綱要》、《就業促進法》、《關於 2009 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法》、《關於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意見》等。³³

另一方面，中共由於長期以來形成的粗放式的生產方式，以掠奪性開發來換取經濟總量的增長，導致了原本稀缺的資源進一步匱乏。這種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模式，必然對現有的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更大的浪費和破壞，嚴重阻礙中共現代化建設速度。因此，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正是對於生態目標的確立，更是

³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頁 1532。

³² 遲福林，「第二次改革目標：公平與可持續發展」，**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0 年 7 月 26 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3097>>。

³³ 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2010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44、50、64、73、242。

對傳統發展觀的一種理性批判，以一種全新的視角來審視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的關係³⁴。

中共「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戰略任務，將「生態文明」作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要求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形成較大規模循環經濟，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明顯改善生態環境質量，以樹立生態文明的觀念。³⁵中共也進一步在 2007~2009 年間連續分別提出《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中國的減災行動》的一系列關於生態文明發展的白皮書，以揭示對於生態環保的重視。

在生態文明提出之後，中共將由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三個文明」發展提升為「四個文明」發展軌跡。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的改革開放政策進入以「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為重點的新階段特性。

總之，論及胡錦濤時期的改革開放政策有別於鄧小平與江澤民時期的根本特性，在於鄧與江的「發展論」到了胡錦濤則提出「科學發展論」，如果說以往是「一心一意謀發展」，到現在則是有所選擇，有所取捨；如果以往是「他力更生」，現在則是自主創新，所以「發展論」對史大林、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而言，是具有中國特色，但是就國家發展理論而言，則是在複製其他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而已，而「科學發展論」則有可能是最終探索出國家特色的發展道路。³⁶

三、胡錦濤調整改革開放政策的主因與目的

可曾試圖思索，為何胡錦濤要將中共實行已久的改革開放政策進行調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胡錦濤調整改革開放政策的主因在於統治權發生了問題，出現了在政治發展過程中所謂的「合法性」(legitimacy)危機，形成中共政治發展的課題。

有關「合法性」危機的定義，學者趙春山明確闡釋：

當人民對於政府決策的正當性表示懷疑，並且動搖了接受政府政策的信念時，合法性問題就因之而產生了。因為，中共維持共黨專政的合法性來源是其『革命的意識形態』和革命領袖的革命『功勳』。但隨著蘇聯的解體

³⁴ 張才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頁200。

³⁵ 趙智奎主編，**改革開放30年思想史**(下卷)，頁820。

³⁶ 楊開煌，「胡錦濤改革政策之繼承與變革」，楊開煌主編，**胡錦濤政權之續與變論文集**(台北：問津堂，2007年)，頁14。

和東歐的非共化，共黨意識形態已成了烏托邦式的空中樓閣，共黨無法依賴其官定的信仰體系來維持統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共黨的領袖權威，亦隨著權力的世代交替而日趨式微。不僅共黨的領導權威式微，整個共黨的社會地位，也有下降的趨勢，這是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副產品。³⁷

經由上面對於中共政治發展的「合法性」危機的說明為基點，用以回顧中共歷代領導人的統治權威合法性，學者趙建民認為：「後鄧時期中共政權所面臨最大的挑戰，便是權威不足的問題」³⁸。所以，可以發現中共從第一代至第三代領導人的統治權威合法性是相當穩固確實的，然而，到了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執政之後，其統治權威的合法性卻面臨重大的挑戰，不論是來自思想、行為、制度以及社會脫序都是可能的原因，這般危及胡錦濤政權的困境，致使胡錦濤不願面對也不行，也因如此，胡錦濤自執政後提出一連串地改革對應政策，除了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繼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著力建設高素質領導班子」³⁹，按照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要求，以維繫統治權威的合法性之外，更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以作為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意識形態思想，冀望以意識形態的形塑，而履行成為合法化的功能。

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在中共改革開放挑戰中的特質

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是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思想體系中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而胡錦濤所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將著重以「社會建設」為重點，持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目的即是為了解決民生問題的困境，而經濟發展更是為了保持社會穩定的關係，最重要的是要在堅持黨國體制領導下的「後極權社會主義發展型國家」政權特徵中進行全社會共同建設，⁴⁰用以達成「社

³⁷ 趙春山，「中共政治體制沿革—問題與對策」，**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6 期(2000 年 6 月)，頁 79。

³⁸ 原因在於：「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的權威，在中共建政史上，占有無可比擬的地位³⁸。毛澤東權威的建立誠先天方便(革命領袖)與後天經營之結果。而鄧小平在 1989 年中共 13 屆 5 中全會辭去中央軍委會主席時，被封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和『總設計師』，可以說鄧小平的領導地位，乃是基於特殊的歷史情境以及他個人的若干有利領導氣質，恐非他人所能望項。而到了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的權威與合法性，則是因為延續了鄧小平所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更使他得以承襲締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衣鉢」。參考資料：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圖書，1997 年)，頁 312、315、317。

³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頁 1739。

⁴⁰ 當前中共的政權特質，乃屬於「後極權社會主義發展型國家」(post-totalitarian soci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的特徵，其優勢在於以黨國為核心，使之得以嚴格控制社會、介入經濟維持高成長，並主動推出社會福利政策，也就是說，其政權本質是結合政治、經濟與社會「三位一體」，

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現。

中共一直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視為是中國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然而，伴隨改革開放所引發的社會轉型，就是造成存在於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淡化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如果主流意識形態宣揚的價值理念與現實的發展不相符合，或者人們從現實經濟社會發展的預測中看不到理想實現的目標，就必然會對主流意識形態產生懷疑和否定的心態。

中共學者也認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正面臨著這種現實的尷尬，而造成這種狀況的就是主流意識形態必須面對但自身又無法解決的兩大現實問題：一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巨大反差，二是中國大陸社會還存在著與社會主義本質相違背的社會問題。這兩大現實問題的制約不是通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自身的自我完善就能解決的問題，因而是當前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⁴¹。

縱使如此，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面臨現實問題的制約，但並未讓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放棄任何一絲可以挽回人民信任的機會，最重要的是要加以穩定鞏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合法統治權威地位，於是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實踐型意識形態，更是別具意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是中共一個具有重要意識形態意涵、規劃出未來十餘年中國大陸社會發展方針的指導目標，尤其在中共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所面臨的挑戰中，倘若能夠妥善運用和發揮「社會主義和

同時具有後極權主義、發展型國家與社會主義特徵的政權，以確保黨國穩定領導為前提進行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根據本文作者從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理論架構出發，探討中共改革開放30年來，中共列寧式黨國體制的持續與變遷，認為中共的政權特徵已經由後極權體制(post-totalitarian regime)，逐漸轉變為後極權發展型國家(post-totalitarian developmental state)，再到由作者所提出的後極權社會主義發展國家(post-totalitarian soci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的政權特徵。參考資料：王信賢，「傾斜的三角：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困境」，**中國大陸研究**，第51卷第3期(2008年9月)，頁43。

⁴¹ 有關第一個問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巨大反差。中共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迅速，社會狀況極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綜合國力明顯增強，國際地位舉足輕重；但是，中國大陸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另外，第二個問題：中國大陸社會還存在著與社會主義本質相違背的社會問題。如社會的貧富差距跨過了國際警戒線，明顯地違背了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目標追求；對工人和農民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明顯地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公平原則；而公共部門的利益化傾向和腐敗的社會性泛濫與社會主義的性質更是不相容，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並在短時間內難以解決，不僅嚴重妨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而且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威信，削弱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說服力。資料來源：劉明君、鄭來春、陳少嵐著，**多元文化衝突與主流意識形態建構**，頁212~214。

諧社會」理論的主要特質，將對於中國大陸的整體國家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作用，以下將接續探究之。

一、回歸社會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本質認識

在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中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構建和諧社會決定》)文件，在論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內容中坦誠地的表示：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不斷加強，綜合國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政治長期保持穩定。同時，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任務艱巨而繁重。特別要看到，我國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我們黨要帶領人民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⁴²

上述這段表述，其實正是間接地承認：中共長期以來的不均衡發展戰略，資源分配不均等導致社會結構發展落後，已經讓中國大陸社會的內部矛盾日益惡化，動搖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基礎；然而，中共政權建立之初，便揭示著要建立社會主義公平社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經濟雖然發展起來，但原本想要建立的公平社會卻不見了。這不僅違背了中共建國當初給予人民的承諾和願景，更是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本質產生背離，即使仍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卻未能完全掌握改進實際的狀態；而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不僅強化了中國大陸的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故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的事實，至少是認清了自改革開放之後處於社會主義

⁴² 《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2006年10月1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初級階段的矛盾和問題，更具體地回歸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本質認識，也就是「社會要和諧，首先要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目的，不是只有盲目地追求經濟增長，而是要回歸實際的經濟均衡發展。

這似乎是表示，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的矛盾與問題愈益顯現惡化後，中共重新注意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根本宗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當上層建築適應生產力發展時，社會形態就呈現出一種相對穩定的和諧狀態。但是，當新的經濟基礎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舊的上層建築就不適應新的經濟基礎發展的需要，此時的社會形態就呈現出一種不穩定、不和諧的狀態。

而當今的中國大陸社會正是呈現出一種不穩定、不和諧的狀態，突顯出從鄧小平以來所推動「地區傾斜」的不均衡發展戰略，且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的改革開放政策，時至今日，事實顯示已經無法適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發展的需要，層出不窮的社會發展問題，成為繼續改革開放道路的隱憂；於是，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提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就是為了要面對舊的上層建築不適應新的經濟基礎發展的需要，解決經濟發展造成的社會矛盾，從經濟建設為唯一核心走向突出社會建設，標誌著中共長期以來以經濟建設為唯一核心的戰略目標會有所調整，經濟建設仍然是重點，但社會建設也納入重要戰略目標。

二、強調堅持「以人為本」的施政原則

中共《構建和諧社會決定》的文件內容，提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遵循的六項原則，分別包括：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民主法治、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以及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⁴³其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正是貫穿所有原則實踐的本質要素。

中共學者認為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規定，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不僅是科學發展觀，而且是最高理念，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也就是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就要做到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與滿足人民群眾根本要求的有機統一，做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實現最廣大群眾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就要不斷滿

⁴³ 《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2006年10月1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⁴⁴。

強調堅持「以人為本」的施政原則，從筆者的觀點看來，其實正是對江澤民所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內容進行適度的調整。其中擴大階層入黨，是「三個代表」思想在中共的意識形態思想中最具突破且最有爭議的部分，江澤民指出：

2000 年全國私營企業已達 176 萬戶，從業人員兩千多萬，如果不正視這個現實，不爭取這支社會力量，甚至有意無意地把他們推到對立面上去，那在政治上對黨是很不利的；而且他們是在黨和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允許下出現的，他們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主義上層建築主導國家經濟政治生活的總的條件下存在和發展的，他們原先大都是一直受黨教育的工人、農民、幹部、知識份子或者他們的子弟，他們的經營活動要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所以他們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來自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軍人、幹部的黨員是黨的隊伍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和骨幹力量，同時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份子吸引到黨內來，並通過黨這個大熔爐不斷提高廣大黨員的思想政治覺悟，從而不斷增強我們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⁴⁵

江澤民「三個代表」中的「擴大階層入黨」，就是將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軍人、幹部等社會主義的基本組成部分，與民營科技企業創業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資本主義的新生社會階層，同時納入中國共產黨內。這樣的突破之舉，不僅在中共黨內引發正反兩派激烈的爭論，更引起外界對於中共高層的執政路線傾向精英主義的質疑和隱憂。然而，胡錦濤強調堅持「以人為本」的施政原則，即是為了消弭重點從新富階層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轉變，同時是對「三個代表」概念進行平民主義的再闡釋，而且是對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闡述。在實踐的層面上，意味著重新重視社會平等和正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反映出傳統的共同利益傾向和黨的領導人對群眾的關切。

⁴⁴ 冷溶主編，**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頁 87。

⁴⁵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江澤民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341、286。

不僅如此，「以人爲本」的原則堅持，也正延續了鄧小平的政治發展觀中對於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發展目標。關於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地位，鄧小平有三個非常重要的思想：一是社會主義根本屬性的高度闡明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繫，認爲「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二是從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角度，闡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三是從社會主義自身的角度，揭示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也就是指明以人民當家做主爲本質特徵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歸根到底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決定的，只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確保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力和權利，才能極大地調動和發揮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積極性創造性，使之成爲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強大動力⁴⁶。鄧小平對於以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徵，正與胡錦濤堅持「以人爲本」的原則不謀而合。

事實上，胡錦濤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中所強調堅持「以人爲本」的施政原則，即使是在「後極權社會主義發展型國家」政權特徵的統治下，仍具有希望朝向「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意涵，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過程，因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種偏重於技術性的政治行爲，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以獲得更多的公民支持，這對胡錦濤執政當局而言，更是當務之急，如能獲得與掌握更多人民群眾對中共當局的支持，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籌碼將更加穩固，中共面臨政權合法性的危機也將如釋重負。若從朝向善治的脈絡觀之，中共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的政府治理，社會公正、公共服務、社會和諧、生態平衡、官員廉潔、政府創新、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這些領域逐漸成爲中共治理改革的重點內容⁴⁷。

再者，綜觀胡錦濤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似乎也借鏡取法於隨著融入全球化體系後，由此倡議興起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中某部分的價值取向，其中第三條路強調共識及社會和諧之重要性，走第三條路的政治人物通常支持開創性及公平性、機會與安全、自我具足與互相依賴等價值，另外第三條路也強調社群及道德責任，實施「第三條路」的政府像是一個文化推廣者，它的目的在於塑造人民的態度、價值、技能、信念及知識，而不只是負責執行經濟及社會政策而已。⁴⁸。體現出中共自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至今，與時俱進之省思，加以

⁴⁶ 關海庭主編，**20世紀中國政治發展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19。

⁴⁷ 俞可平主編，**中國治理變遷3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9。

⁴⁸ 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是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之外的一種經濟體制的主

確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黨」的政治使命。

三、深化意識形態功能，以利持續推動改革開放政策

中共第四代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以作為推動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踐型意識型態思想，由此可看出中共當局對於意識形態的高度重視及思辨，意識形態並不是一種僵化和固定不變的世界觀，而是一種解釋社會現實的動態體系，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正是一種有別於中國大陸當前社會變遷發展現狀的願景期許，願能藉此透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達到社會整合的效益。

無庸置疑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已經成為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的官方意識形態。所謂「官方意識形態」即為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它除了具有一般政治意識形態的特質與功能外，亦凸顯出具有「官方」性質的重要特性。也就是說，官方意識形態，它是一種政治上的信念體系，是為了催生行動而生的一種政治理念，不僅代表統治階級的理念，且還代表某一種社會階級或團體的世界觀，是表明階級或是社會利益的政治性理念，是被剝削或是被壓迫階級的錯謬意識，使人產生歸屬於某種社會群體的感覺，是官方所認定的政治理念，用來增加體系的正當性，是號稱獨享真理的全方位政治教條，是抽象但高度體系化的政治理念⁴⁹。因此，官方意識形態可以說是同時構成統治集團與國家兩者內涵的重要屬性。

身為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具備著西方學者舒曼(Franz Schurmann)所提出意識形態的功能特性，認為意識形態是為一種感覺、價值與理念等，在不同的時代皆具有不同的重要性，而隨著政治的發展，扮演的功能亦有所不同，總括而言，關於意識形態的功能⁵⁰分別為解釋(explain)⁵¹、

張，保守派、社會主義者及法西斯者都嘗試過。總而言之，「第三條路」具有務實的、全球化、資訊社會、社群、市場經濟、充分就業性、機會平等、功績制度、福祉/機會全面提升、將弱勢者納入社會、同時強調權利與責任、照顧之使其有工作能力、競爭/市場式國家的特質。資料來源：海伍德(Andrew Heywood)著、陳思賢譯，**政治的意識形態**(台北：五南，2009年)，頁131~134；Giddens, A.,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⁴⁹ 海伍德(Andrew Heywood)著、陳思賢譯，**政治的意識形態**，頁5。

⁵⁰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68~73.

⁵¹ 首先，意識形態具有解釋(explain)的功能，意指意識形態提供一套認知的結構、觀念的公式。胡錦濤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提供一套認知的結構及觀念的公式，也就是胡錦濤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視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理論」，亦即為舒曼所稱之的「純粹意識形態」，而在「十六大」之後執政的實踐過程中，則是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際經驗，同時結合著「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為其執政的「思想」根源，以構成「實踐意識形態」，最後結合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的實際需求及現實狀態，進而提

規範(norm)⁵²、整合(integration)⁵³、認同(identify)⁵⁴、指導方針(guide)⁵⁵、合法化(legitimacy)⁵⁶等六項功能。

四、重視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

自從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上任執政之後，在其所使用的政治修辭語藝方面，表明了對於「社會主義」特性的堅持，近年來幾乎每一個新的政治和思想概念都冠上「社會主義」一詞，諸如：「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新農村」、「社會主義榮辱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這些具有「社會主義」概念意涵的目的，即是為了推動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所主張的合法化價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以往的中共領導人，往往將施政核心目標關注在經濟建設的成效之上；然而，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雖然也一如以往地繼續堅持發展經濟，但其發展經濟的目標卻是為了要保持社會的均富穩定，以利社會建設的開展，而另一更重要地施政核心就是開始高度重視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

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思想體系，目的在於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所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體現中共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

⁵² 其次，意識形態提供一套規範(norm)，作為個人或集體行動的判斷，也就是如何行動和如何判斷的準則。中共《構建和諧社會決定》的文件內容，所提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遵循的六項原則，分別包括：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民主法治、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以及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此六項必須遵循的原則，成為中共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規範判準。

⁵³ 另外，意識形態更具有整合(integration)的功能，意即是為處理衝突的一個工具，以不致使衝突擴大。中共《構建和諧社會決定》文件中明白指出中國大陸社會目前所存有的種種內部矛盾問題，更是引發社會問題衝突的關鍵要素，所以可見中共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視為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成為處理衝突的一個有效工具，能夠不致使衝突擴大。

⁵⁴ 再者，意識形態也具有認同(identify)的功能，意即意識形態是一套信仰、價值，藉此獲得他人的認同。因此，在中共《構建和諧社會決定》文件內容中提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的在於達到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體價值要求，以期能夠獲得人民的信賴與認同。

⁵⁵ 不僅如此，意識形態更是一種指導方針(guide)，以作為個人或集體生活的動力，提供目的感和行動的誓言，作為個人或集體行動的指導方針。中共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除了將「科學發展觀」作為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意義之外，更在《構建和諧社會決定》文件中擬訂表示希望在二〇二〇年達到和諧社會的目標，並且落實六個主要項目的具體內容，作為個人或集體生活的動力，藉以提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的感和行動的誓言，成為個人或集體行動的指導方針。

⁵⁶ 最後，意識形態具備合法化(legitimacy)的功能，提供一套權力和行動合法性的來源，也就是真理站在我這邊，所以你要服從我。因此，構建一個屬於「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是中共第四代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所提出的一個具有重要意識形態意涵、規範未來十餘年中國大陸社會發展方向目標的重要思想體系，以樹立黨內理論權威地位，為自己新的政策方針建構合理化、合法化基礎，同時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意涵實際運用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之中，認為「十一五」是承先啓後的重要時期，且要積極促進社會和諧。期望透過納入實際的政策舉措，用以強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合法化功能，相信對於「十二五」規劃亦涵蓋戰略指導作用。

中共《構建和諧社會決定》文件，在提及落實六個主要項目的具體內容中，特別提到要「建設和諧文化，鞏固社會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因為「建設和諧文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所以強調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形成全民族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團結和睦的精神紐帶」，「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培育文明道德風尚」，「堅持正確導向，營造積極健康的思想輿論氛圍」以及「廣泛開展和諧創建活動，形成人人促進和諧的局面」。⁵⁷

胡錦濤之所以會如此高度重視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根本原因應歸咎於改革開放之後，在內部和外部環境的文化層面上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導致社會心態日趨複雜變化，社會公正信念產生動搖，而在多元文化衝突中，產生弱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認同的影響，道德價值失序，社會動盪不安。也因如此，精神文明的文化基礎建設的深化與落實，已成為胡錦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價值核心，掌握「存在決定意識；意識決定存在」的關鍵，即更是掌握了確保中共統治權威合法性的基礎本質。

而在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並非只侷限於「社會主義」的範疇，而是同時將中國源遠流長的儒家思想融合於其中，這更代表著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已開始從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家的觀點，試圖帶入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實，從中共近年來紛紛積極地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即可印證中共領導高層對於儒家思想的重視，更具體而言，應可說明是對於中國文明的重視。

58

可曾試圖設想，為何當初在文化大革命一心主張「批林批孔」運動的中國共產黨，時至今日的中共領導當局卻一意地堅持運用發揚中國文明，使之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此，有位西方學者精闢入裡地指出：

孔子的主張與道德訓誡深深影響著中國人，他的主張左右了政府制度，《論語》則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儒家是統合的思考模式，融合其他思想派別的信念，尤其是道教與佛教，但孔子本身的想法仍然是中心思想。他強調道德，人類的事物必須好好治理穩定與一致尤其重要，因為

⁵⁷《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2006年10月1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⁵⁸中共認為，「孔子學院」是以教授漢語和傳播中華文化為宗旨的非營利的公益機構，是海外朋友學習漢語了解中國的窗口，也是學習借鑑不同文化、促進多元文化交流發展而構建和諧世界的平台。

他生平經歷了分裂時代的動盪與不穩定。他的思想自此形成中國文明的基本價值。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期，孔子的影響才漸漸衰退，不過即使是在二十世紀的大動亂中，包括共產黨統治期間，他的影響力仍然持續且明顯可見。中國文明有兩項鮮明的傳承可以回溯到孔子，也就是政府與教育。文明國度不只體現與近代中國歷史之間的更密切關係，就像一般的民族國家一樣，而且更明顯的是，至少有兩千年的歷史，這段悠久的歷史還不時介入現在，成為現在的指引與量尺。這個文明國度持續提醒大家，中國是中央大國，是世界的中心，因為擁有的地位不同於其他國家。「文明」這個詞通常表示較遙遠與間接的影響，是惰性而被動的存在。不過，在中國的例子，活生生的不只是歷史而已，文明也是：活生生的文明提供主要的認同與脈絡，讓中國人藉以想到他們的國家，並且定義自己。⁵⁹

中國文明的價值影響淵遠流長，其重視道德、強調穩定的本質精神訴求，對於歷經改革開放後劇烈社會轉型的中國大陸內部矛盾而言，相對格外重要，顯而易見地，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正希望透過藉由運用「社會主義」與「中國文明」的相互作用結合，樹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典範，一方面希望提升促進道德思想的教化，另一方面更希望強化改革開放的具體成果，為中國的大國崛起之路，獲得充滿自信的文明依歸。

如同西方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所言，他認為：

後冷戰世界是由七或八大文明構成的世界。文化的異同決定了國家的利益、敵對及結盟。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主要來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升高為大型戰爭的地方衝突，多半源於不同文明的集團或國家。不同的文明，其政經發展的主要模式各異，國際間重大議題涉及文明間的歧異，權力正由西方長期獨霸轉向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全球政治已朝多極和多元文明發展」。再者，「無論如何，未來數十年亞洲經濟的成長，將對西方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造成極為震盪的效應，尤其如果中國繼續成長，將在各大文明之間產生大規模的權力變動。⁶⁰

⁵⁹ 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著、李隆生、張逸安譯，當中國統治世界(台北：聯經，2010年)，頁244~250。

⁶⁰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1997)

西方學者杭亭頓的預估與分析，似乎與當今國際關係的發展情勢不謀而合，中國大陸正因經濟成就的亮眼表現，逐漸於國際間嶄露頭角，大國崛起的態勢樣貌日益顯現，成爲世界上的大國可說是指日可待，映照現今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視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除了爲求鞏固延續中共統治權威的合法性地位外，同時寄希望於發揚中國文明的「軟實力」(soft power)意味目的相當濃厚，隨著中國大陸近年來陸續舉辦 2008 年北京奧運、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等國際大型盛會，皆可視爲「軟實力」的運用展現。

最後，針對此一論述主軸，筆者認爲對於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如此高度重視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的舉措，似乎正也借鏡取法於由西方古典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著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韋伯在這本書中所關注之主題在於：

契約勞工與日酬勞工在生活條件與外觀上的對比，大致上是：一方面是接受遵從與蔭庇的傳統模式，另一方面則是一種經濟個人主義的態度。但是，後者這種態度卻很明顯的不只是日酬勞工之經濟狀況的一種結果，而是一種倫理觀念的展現。一般說來，世人多是專注於經濟活動和利益追求，對於宗教要不是漠不關心，就是正面的與之對立，因為他們的活動是直接面對著『物質』的世界，而宗教所關懷的卻是『精神』的世界。然而，基督新教非但不放鬆教會對教徒日常活動的控制，而且還要求教徒接受一種比天主教更加嚴謹的生活紀律，以此，宗教因素便因而注入信仰者之生活的所有層面裡。因此，透過正當的經濟活動而完全投入財富的追求，並且避免以這樣的經濟活動的所得來做個人的享樂，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成爲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所獨具的特色。此一精神乃根植於一個信仰，認爲在一個選定的職業上有效率地工作的價值，是一種義務和一種美德。⁶¹

在韋伯眼中，認爲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能夠擁有重大成就，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在於基督新教教義中對於道德信仰的涵化重視，並且將此倫理觀念使之與人們的日常經濟活動相互結合，促進提升工作效率，同時維持社會穩定，印證「**存在決定意識；意識決定存在**」的價值意義。也因如此，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重

年)，頁 14~15、155。

⁶¹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簡惠美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台北：遠流，1994 年)，頁 212~215。

新提倡中國文明的目的，不僅是希望能夠改善中國傳統以來在國家社會的治理上，習慣將「國家/社會」關係視之為一體，一向偏重國家權威，而忽視社會關係注重倫理的本質需求，尤其在歷經世俗化的經濟改革開放之後，牽涉道德倫理價值的社會問題日益顯現，無法及時解決的後果就是造成社會脫序、社會不和諧。此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希望藉由中國文明儒家思想中的倫理道德學說，所強調的重視道德、保持穩定的精神價值訴求，透過注重道德精神的教化傳播和宣揚，有助且有利於持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發展、以及後續一系列的改革開放政策，發揮每個人在工作上的效率價值，改善自改革開放後遭受多元文化衝擊影響下的社會不良風氣，創造如同在儒家思想中充滿仁愛的大同社會，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涵正是立基於此一美好願景，表明出追求社會和諧是中華民族的理想，用以落實發揮「儒家倫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

陸、結論

掌握意識形態的主導權與解釋權，是中共黨政體制下，領導人鞏固領導權的重要工具，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意識形態思想體系，作為繼續推動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脈絡，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希望能夠建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實踐型意識形態，以樹立黨內理論權威地位，為自己新的政策方針建構合理化、合法化的基礎；當然，之所以如此，想必一定是對於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是一個不和諧的社會而有所體認，尤其是社會意識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人作為社會體系運作的主體，在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必定更加複雜多變，變化多端且對於政府的政策深感不滿不安的社會意識，成為不和諧社會的根本源頭，更也使得中共推動改革開放政策面臨種種挑戰。

所以，如果能夠成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論述，將有助於確立第四代領導集體的統治權威，甚至能夠適時發揮「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在中共改革開放挑戰中的特質，讓中共領導集體主動推出的意識形態思想體系被人民獲得認同與信任。

中共意識形態，指的是由當權者所支持的路線思想，這一套路線思想除了反映當權者個人和派系的利益和世界觀外，還企圖挑起社會大眾的歷史意識，為他們提供認知，評化週遭環境的能力，從而引導他們按照某些綱領步驟去從事社會實踐，以便達到當權者所欲達到的目標。

因此，按照中共意識形態的邏輯鋪陳，中共意識形態不能用「共產主義」四個字一語概括，隨著中共組黨、革命、建政、領導人的更替，中共意識形態在時空歷史階段中有不同的發展與名辭意涵，包括「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同時也更加反映出，中共各個時代的領導人的意識形態思想，乃是為了因應執政現狀環境的需求而轉化生成，如：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毛澤東思想」，是為了解決政治上的問題；中共第二代領導人的「鄧小平理論」，是為了解決經濟上的問題；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則是為了解決執政上的問題；而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勢必將建構一套屬於自身的路線思想，以合乎現實的執政考量與需求，由目前的狀態觀之，胡錦濤執政後所面臨的將是如何解決改革開放後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問題，胡錦濤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將對於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具有重要的引導關鍵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共的「十二五規劃」中提出「民富」概念，更把「社會體制改革」視為當前施政方針的重中之重。

從鄧小平啓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共每一階段的領導人所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重點方向，皆會為了因應時代環境的變遷及發展而進行官方意識形態思想體系的轉向和調適，尤其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提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對於中共當前與未來的改革開放政策發展目標方略，不僅具備有別於以往的改革開放意義價值，更存有著在改革開放挑戰中的特質，呈現出改革開放後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持續與轉變之重要特性。然而，對於中共能否在 2020 年成功達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願景，就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必定是個崎嶇、艱難且不易達成的任務挑戰。

總之，中共未來的國家發展戰略目標，除了堅持且延續改革開放基礎外，並將針對目前面臨的問題癥結進行適當地調整和改善，經濟持續發展是維繫中國大陸社會穩定的根本，經濟衰退則會更亂，另外，可以預知在可見的未來，「社會建設」將成為中共政策施展最重要的部分，之所以進而提出關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期望有利於提升中共社會主義建設的整體發展格局，強化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中共的領導下，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參考書目

- Andrew Heywood 著，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等譯，**最新政治學新論** (台北：韋伯文化，2001 年)。
- Andrew Heywood 著，陳思賢譯，**政治的意識形態**(台北：五南，2009 年)。
- Anthony Giddens 著，簡惠美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台北：遠流，1994 年)。
- John Naisbitt、Doris Naisbitt 合著，侯秀琴譯，**中國大趨勢：八大支柱撐起經濟強權**(台北：天下遠見，2009 年)，頁 206。
- Martin Jacques 著，李隆生、張逸安譯，**當中國統治世界**(台北：聯經，2010 年)。
- Samuel P.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1997 年)。
- 中共中央黨校，**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學習問答**(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 年)。
- 中共中央黨校編寫組，**「三個代表」學習讀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 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
- 王曉明，**半張臉—中國的新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王信賢，「傾斜的三角：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困境」，**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37~62。
- 方生主編，**走向開放的中國經濟：理論、模式、路線**(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 包玉娥等著，**20 世紀中國政治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汝信、陸學藝、李培林，**2010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探索中國經濟順利轉型的秘密**(台北：麥格羅希爾，2005 年)。
- 吳安家，**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1949~2003 年)**(台北：國史館，2004 年)。
- 邵一江，「儒家思想與構建和諧社會探析」，**科學社會主義**(北京)，2007 年第 4 期，頁 96~98。
- 改革開放三十年編寫組織，**改革開放三十年**(北京：中文文獻出版社，2008 年)。

- 李強，**社會分層十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 李忠杰、徐耀新、魏力著，**社會主義改革史**(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 李培林，**和諧社會十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 李培林等著，**社會衝突與階級意識：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 李英明，「論中共意識形態」，**共黨問題研究**，第13卷第12期(1987年12月)，頁29~37。
- 宋國誠，「科學發展觀—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中國大陸研究**，第51卷第2期，(2008年6月)，頁97~134。
- 冷溶主編，**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84)。
- 林琳文，**後社會主義中國：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台北：生智，1997年)。
- 祖嘉合，「試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和諧社會建設的內在關聯性」，**思想教育研究**(北京)，2010年第1期，頁12~16。
- 胡鞍鋼，**中國崛起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俞可平主編，**中國政治發展30年(1978~2008)**(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年)。
- ，**中國治理變遷3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 俞吾金，**意識形態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張才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
- 張國聖，「論析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研究途徑」，**中共研究**，第32卷第1期(1998年1月)，頁95~107。
- 曹小平，「構建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的內在本質與核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北京)，2007年第1期，頁69~73。
- 黃丹森，「關於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哲學思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北京)，第44卷第5期(2007年9月)，頁5~13。
- 陳重成、舒中興著，**崛起與蛻變中的中國—入世後的機遇與挑戰**(台北：遠景基金會，2004年)。
- 馮特君、王曉峰著，**對外開放與今日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 靳江好、王郅強主編，**和諧社會建設與社會矛盾調節機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楊開煌主編、張執中、馬彥彬等著，**胡錦濤政權之續與變論文集**(台北：問津堂書局，2007年)。
- 趙智奎主編，**改革開放 30 年思想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改革開放 30 年思想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圖書，1997年)。
- ，「科學發展觀與胡錦濤路線」，**展望與探索**，第 5 卷第 12 期(2007 年 12 月)，頁 43~46。
- 趙春山，「論中共的對外開放政策」，**東亞季刊**，第 26 卷第 1 期(1994 年 7 月)，頁 1~21。
- ，「中共政治體制沿革—問題與對策」，**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6 期(2000 年 6 月)，頁 77~85。
- 劉吉，**社會主義改革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劉明君、鄭來春、陳少嵐著，**多元文化衝突與主流意識形態建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 鄭佳明，「中國社會轉型與價值變遷」，**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北京)，第 25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113~126。
- 謝舜，**和諧社會：理論與經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 關海庭主編，**20 世紀中國政治發展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蕭涓水主編，**科學發展觀引領下的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Cao Fangjun,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China's Road to Modernization,"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43 (Fall 2009), pp. 7~16.
- Chu-Yuan Cheng,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lan: Strategy, Agenda, and Prospects," *An American Review*, Vol. 34 (2007), pp. 47~59.
-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Han, Ai,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chieving Individual Harmon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3 (Aug 2008), pp.143~164.
- Rosemary Foot, "China and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Order: Harmonious Society and Harmonious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2007 Annual Meeting*, pp. 1~12.
- Susan Shirk, *China-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Xing, Guoxin,“Hu Jintao's Political Thinking and Legitimacy Building: A
Post-Marxist Perspective”*An American Review*, Vol. 36 (2009) , pp. 213~226.